

巍巍学府与民族命运的百年交响

——读《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有感

任吉东



个人责任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

战火淬炼中的爱国情怀

本书对抗战时期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论述尤为深刻。南开大学作为抗日战争中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高校之一,校园被炸毁,师生流离失所,但爱国主义教育的火种从未熄灭。作者通过大量校友回忆和历史资料,生动再现了南开师生在艰难困苦中坚持办学、坚持抗日救亡的感人事迹。

“暴日肆狂毁我南开”的悲壮历史是南开人永志不忘的民族记忆。1937年7月,日军野蛮轰炸南开大学,校园几乎被夷为平地。张伯苓校长慨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不灭者为南开之精神。本书详细记述了南开师生在危难中的坚韧不屈:教员们冒着炮火抢救图书仪器,学生们组织抗日宣传队奔赴后方。这种“越难越开”的品格,正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在战火中的淬炼与升华。

西南联大时期的弦歌不辍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篇章。书中以专章讲述了南开与北大、清华在昆明合组西南联大的历史。在敌机轰炸、物资匮乏的极端环境下,南开师生秉持“刚毅坚卓”的精神,坚持教学科研。本书特别提到,西南联大时期南开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课程体系,如开设“抗战史料整理”等实践课程,组织学生参与战时服务,真正践行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南开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天津爱国运动的重镇。书中详细记载了于方舟、马骏等南开英烈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事迹,以及周恩来、郭永怀等杰出校友的爱国奉献。这些真实的故事,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南开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理念的传承,更是鲜血与生命的践履。

爱国主义教育的南开范式

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系统总结了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范式。作者通过多维度分析,总结出南开大学以爱国主义为本色的爱国奋斗的南开道路、“越难越开”的南开品格与“公能日新”的南开精神。

“公能”育人体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机制。张伯苓提出“德育为万事之本”,强调爱国首先要立德。本书详细阐述了南开大学如何通过“德育课程化、课程德育化”的方式,将爱国主义融入各学科教学。例如,历史课注重近代国耻教育,理科课强调科学报国,甚至体育课也被赋予“强身健体以御外侮”的内涵。这种全方位的育人模式,使爱国主义不再是空洞的口号,

而是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实践导向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明特色。书中提到,南开大学早在建校初期就提倡“土货化”办学,反对脱离国情的洋化教育。改革开放后,南开进一步提出“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办学理念,通过社会实践、科研攻关等方式,引导学生将爱国情怀转化为服务国家的实际行动。

师德师风与大师传承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保障。本书以专章论述了南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师资建设理念。从姜立夫、邱宗岳到杨石先、何炳林,一代代南开教师不仅以学术造诣滋养学生,更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书中特别提到,南开注重教师的爱国情怀培养,将“教育育人大先生”作为师资建设的标准,这种理念对当代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发展

本书不仅回顾历史,也着眼于现实和未来。作者用相当篇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发展。在新时期,南开大学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将其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探索出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教育模式。

德育“南开模式”的现代转型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书中提到,新时代南开着力打造“三维融通、五育并举”的贯通式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形成“1234”南开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通过“课程思政”建设,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具时代性和针对性。

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是南开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代的突出体现。本书以专章回顾了南开人始终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贯穿于学科建设之中,通过擘画学科、争创一流服务国家需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南开大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创新体制机制,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医工发展”四大计划,持续推进文、理、工、医多学科交叉融合。纵观南开百年学科的发展历程,学科布局在不同时代虽有变化,但为国奉献、争创一流始终是南开人不变的理念,学科发展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走出了一条具有南开特色、不断勇攀高峰的学科发展之路。

百年南开的启示与展望

《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向我们展示了一所大学与一个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动人历程。南开大学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融入血脉、浸入灵魂的精神传承;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持之以恒、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塑造了南开的品格,也培养了无数以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己任的优秀人才。

读完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爱国主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教育,它关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连接,关乎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关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南开大学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根植历史、面向未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情感与理性并重,认识与实践统一。

当前,我们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南开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史话》的出版具有其特殊意义。它提醒我们,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塑造灵魂;大学不仅要服务社会,更要引领时代。南开大学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总结、继承和发扬。

题图摄影:王爽

角老人皱纹里藏着的故事,懒得去琢磨深夜加班时路灯下影子的形状。同样的,依赖AI提炼观点,慢慢就会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很难从平凡日常里挖掘出深刻的主题。就像王葆在宝葫芦的庇护下,连简单的数学题都不愿演算,最终在考试中出尽洋相。创作者依赖AI,也必然会逐渐失去对文字的敏感度,最终写出的作品只能是千篇一律的模板化产物,毫无个性可言。

况且, AI的所谓“创作”,本质上是对海量现有文本的重组与模仿,就像宝葫芦变出来的东西都来自对他人的“偷窃”,缺乏真正的原创性。那些AI生成的“佳作”看似新颖、漂亮,实则是对海量文学作品的拆解与拼接,并没有融入创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可真正的文学创作,从来都是独一无二的。众多名家经典作品能够穿越时光,正因它们承载着创作者独有的思考与情感,这是AI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制的。

AI能模仿汪曾祺、梁实秋的笔调描写食物,却写不出他们对故乡土人情的深情,能模仿出鲁迅的冷峻文风,却无法拥有对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精神。

在《宝葫芦的秘密》结尾,主人公王葆扔掉宝葫芦后幡然醒悟:“真正的成长没有不劳而获。”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领域。创作时, AI可以当辅助工具,帮助创作者整理素材,校对文字,但无法替代创作者的思考与情感。事实上,文学创作就像一场漫长的修行,需要写作者踏踏实实地观察生活,阅读积累,锤炼文字,在一次次修改与打磨中,让文字拥有温度与力量。摒弃“走捷径”的幻想,不把AI当作“宝葫芦”,才能写出真正属于自己并能打动人心的作品。

拾柴篇

AI不是文学创作的“宝葫芦”

李清



现代作家、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张天翼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经典童话《宝葫芦的秘密》,近日重读这部作品,主人公小学生王葆因依赖宝葫芦陷入一连串荒诞麻烦,让我想起当下文学圈对AI(人工智能)的热议。

随着AI横空出世并被广泛应用,有人将其视作能一键生成佳作的“法宝”,觉得只要输入提示词,就能坐享其成。这种心态,与王葆渴望不费力获得答案的想法非常相似。据说有人用AI写作投稿,短时间就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然而,就像宝葫芦的“便利”终会变成陷阱,AI绝非文学创作的“宝葫芦”。真正的文学创作之路,从来没有捷径可走。

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AI的确能给人带来惊喜。短时间内,它就能生成基本符合语法规范的文字,甚至能模仿特定作家的文风。输入“古风虐恋”“科幻悬疑”之类的标签,它即能快速搭建起故事框架。这像极了宝葫芦帮王葆变出玩具、偷来试卷答案的情形。那种不费吹灰之力的“收获”,很容易让人产生“创作可以走捷径”的错觉。有青年作者坦言,曾试着用AI生成小说投给一些知名网络平台,起初觉得省时省力,可越往后写越发现,AI给出的文字空有形式却没有灵魂。它能描述落叶飘零,却写不出游子见落叶时心头的酸涩,能构建出亲人离别的场景,却传递不了藏在细节里的不舍。就像宝葫芦变出来的自行车,虽能代步,却始终少了自己攒钱买车的那份珍视。

更值得警惕的是,AI的“助力”会悄悄偷走创作者的核心能力,这与宝葫芦让王葆逐渐丧失劳动与学习动力几乎如出一辙。文学创作的魅力,本就藏在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对情感的体悟,以及将碎片化感受转化为文字的能力里。习惯了依赖AI生成情节,就会慢慢懒得去留意街

肥、除虫。他戴着草帽,脖子上挂着毛巾,钻进玉米地没多会儿,衣服就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有一次,我去玉米地送水,刚走进去就觉得闷热得喘不过气,玉米叶刮在胳膊上,留下一道道红印。找到父亲时,他正背着装满肥料的背篓,一步一步缓慢地挪动着脚步,每走一步,背篓子就往肩膀里勒紧一分。我喊了声“爸”,他回过头,脸上全是汗珠,笑容

却格外明亮:“快出去,这里热,别中暑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父亲不是不怕热、不怕累,只是为了这个家,他把所有的苦都藏在了心里,把所有的力量都给了土地。

秋收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也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金黄的稻穗压弯了稻秆,父亲拿着镰刀,弯着腰,一刀一刀地收割着。他割稻的动作很熟练,左手握住稻秆,右手挥镰,“唰”的一声,一束稻穗就落在了身后。一天下来,他能割好几亩地,身后的稻子堆成了小山。傍晚时分,父亲会把收割下来的稻子收好,第二天摊在晒场上,用木耙一遍遍地翻动,让阳光把稻谷里的水分晒干。夕阳洒在晒场上,也洒在父亲的身上。他坐在晒场边的石碾上,点上一支烟,看着满场的稻谷,嘴角不自觉地向上扬起。那是丰收的喜悦,是对父亲的爱。



董国宾

土地最好的赞美。

冬天的土地看似沉寂,父亲却没闲着。他会把秋收后留下的秸秆切碎,拌上牲畜粪便堆成农家肥,再用塑料布仔细盖好,让肥料在冬日里慢慢发酵,等来年春天撒进地里,给庄稼添足“营养”。他还会把家里的锄头、镰刀、犁耙等都搬到院子里,用砂纸一遍遍打磨生锈的部件,再给轴承上点机油,确保开春下地时农具都好用。父亲曾对我说:“土地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才会对你好。这些农具收拾利索了,开春种地才不耽误工夫,庄稼才能长得旺。”

父亲这一辈子,没读过多少书,却懂得最朴素的道理。他常说:“人不能忘本,我们的根在泥土里,在田埂上。”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总想着长大后离开农村,去大城市生活。后来,我在城市里打拼,遇到困难时,总会想起父亲在田埂上劳作的身影,想起他说过的话。是啊,父亲就像土地一样,默默付出,从不抱怨,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他的脊梁,是在与土地的朝夕相处中,在一次次的劳作中,慢慢“长”出来的。那是坚韧的脊梁,是奉献的脊梁,是支撑着一个家庭,也支撑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脊梁。

我成家有了孩子,带孩子回老家时,我牵着孩子的手,走到田埂上,指着正在劳作的父亲,对孩子说:“你看,爷爷的脊梁,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是最坚强的脊梁。”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伸手去摸田埂上的泥土,脸上满是好奇。我想,等孩子长大后,他一定会明白,爷爷的脊梁里,藏着对土地的热爱,对家人的责任,也藏着我们每个人的根。

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脊梁,不仅是父亲的脊梁,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脊梁,是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奋力向前的脊梁。

由天津率先主导并推动实施的“鲁班工坊”,已经成为享誉国际的职业教育品牌项目。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建筑作坊,而是一个旨在培养全球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当地青年就业和民生改善的现代化平台。“鲁班工坊”成功架起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桥梁,它所传达出来的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赋予了鲁班这个古老的名字以新的时代内涵。

鲁班,据传姓公输,名班,亦作般、盘,或称公输子、班输,春秋时期鲁国人,故通称“鲁班”“鲁盘”。鲁班出生于工匠世家,自幼随家人参加工程实践,逐渐掌握了高超的技艺。相传鲁班的发明创造覆盖多个领域,包括土木工程建筑中所需的刨子、墨斗等木工工具,他还为楚国制造了云梯等军事攻城器械和石磨、井钻等生活与农用器具。鲁班的发明创造对后世影响巨大,推动了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他的深远影响早已超越技术层面,而成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化身,被后世工匠尊称为“先师”“祖师”。以其名字命名的“鲁班奖”,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最高荣誉奖项。

鲁班庙(亦称公输子祠)作为专门为纪念鲁班而修建的场所,也是工匠精神传承的实体见证。据记载,多数鲁班庙建于明清时期。鲁班庙在全国范围内分布广泛,建筑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往往更为密集。资料显示,广州在清末民初曾有鲁班庙14座,广州六榕寺内的鲁班殿建成于明洪武年间,或为全国最早。

由鲁班工坊说到鲁班庙



罗丹



早的鲁班庙。北京在清代至少有10座鲁班庙,其中以东岳庙内的鲁班殿最为兴盛,内务府及行会的工程祭祀仪式常在此举行。较为知名的还有山东曲阜的鲁班庙、香港的鲁班先师庙等。

众多鲁班庙中,天津蓟州区的鲁班庙因其保存的完整性、独立的建筑规格及其承载的红色印记而引人注目。蓟州鲁班庙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据院落内现存的《重修公输子庙碑记》碑刻记载,该庙曾于光绪三年(1877)重修。庙宇坐落于今蓟州区府后街与渔阳北路交口东北方向,与其西侧的蓟州文庙相距仅百米。建筑坐北朝南,为典型的清代官式风格,由山门、正殿、东西配殿等组成。山门为面阔三间的硬山顶建筑,明间穿堂,次间外檐封护开六角形花窗。正殿又称先师殿,面阔三间,绿琉璃瓦剪边九脊歇山顶。檐下斗拱一斗三升交麻叶,角科宝瓶下出单昂。殿内正中有着1986年重塑的鲁班坐像,上悬“巧圣仙师”红匾。两侧为木匠、瓦匠、石匠、书童四大弟子塑像。

蓟州鲁班庙的西配殿是“一分利”文具店旧址,现已被列入天津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1933年,中共迁(西)遵(化)蓟(县)中心县委书记李子光等人筹资在此创办了“一分利”文具店,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地点。1933年至1938年,“一分利”文具店成为蓟县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很多革命志士在此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从事革命活动,为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积蓄了力量。“一分利”文具店旧址室内现设有多个图文专题展,以供参观者了解与缅怀不畏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先烈。

1973年,鲁班庙被列为蓟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到鲁班庙考察调研,称其“工精料实”,认为像这样规模的鲁班庙在全国甚是少见,故提议加以维修。1986年,天津市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鲁班庙,并于翌年对外开放。1991年,鲁班庙被公布为第二批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鲁班庙已成为蓟州古城游的重要文旅点位和红色教育基地,得到了极为妥善的保护与利用。

鲁班庙对外开放后,发行过多款参观券,于方寸间生动展现了建筑与陈设的特点。早期的塑料材质参观券(如题图),与同时期独乐寺、盘山、黄崖关长城等处的塑料券相似,带有蓟县各景区与文保单位参观券的时代特色。塑料券比纸质券便于保存,不易磨损和褪色。票券边缘常标注“旅游留念”字样,并可打孔穿绳,作为书签使用。此券描绘的是院落中正殿与配殿的建筑外景,以黑色线条描边,并在不同部位施以浅金、明黄、深红等色彩。图中清晰可见正殿的规模与形制,如明间设菱花格门,次间作槛窗,格栅窗。背景留白位置有高大绿植衬托,提升了画面的视觉观感。票券左侧的副券栏采用点断工艺分隔,检票撕取时可使票券更为规整。

之后,蓟州鲁班庙还发行了卡其色的发票型参观券,左侧为存根栏和发票联,管理机构名称、票价、日期等信息完备。主券图案为在街道上拍摄的鲁班庙山门外景照片。山门为参观入口,明间板门敞开,底部两侧有抱鼓石。近年来鲁班庙推出的竖版参观券,与独乐寺、白塔寺、蓟州文庙的票券采用相同版式,在画面元素和配色上突出个性,主图中心为正殿内的鲁班塑像,神态庄重谦和。票券设计古朴典雅,富有艺术观赏与文化收藏价值。

蓟州鲁班庙展现了中国古代匠作文化的精华,更在近代革命浪潮中融入了救国图存的红色基因。从鲁班庙到鲁班工坊,不仅仅是名称的古为今用,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对话与精神升华,其内涵在不断丰富与演进。它标志着中国传统工匠智慧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现代化的姿态,跨越国界,服务全球,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沽上丛话

小站作为天津市津南区一重镇,如今已是极为繁华。但“小站”这一地名在清朝中叶并不存在,它的出现与闻名遐迩的小站稻及小站稻的拓植者周盛传有直接关系。

小站稻不仅在今天的国际市场声名远扬,其早在清代就已经深得世人赞美。小站这个地方,当初虽无“小站”这一地名,但这里从明代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为什么在这里种植呢?《明史》记载说,万历年间,汪应蛟驻兵天津,驻防官兵有四千人,每年饷银六万两,由民间征发。面对这种情况,汪应蛟认为:“留兵则民告病,恤民则军不给,唯屯田可以足食。”他看见葛沽、白塘口一带的土地,无水即碱,得水滋润,于是募民垦田五千余亩,其中水田占四成,每年亩收四五石。其后,又设闸穿渠,引海河淡水灌田,形成十围,水稻生产扩展至天津南郊何家圈、双港、辛庄、泥沽等处。不久以后,汪应蛟去任,田地又大部分荒芜。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八)

周氏祠堂新农寺

章用秀

中,也曾提出过垦种的建议,并且记载了明代天津农区开荒垦种的情形。

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海防地位的提高,清政府对沿海屯垦也重视起来。同治十年(1871)安徽合肥人周盛传奉李鸿章之命,率九千淮军驻守于此。周盛传在这一带屯田练兵,总共分扎18个营盘,动用全部人马,开挖马厂减河,筑筑驿道,四十里设一大站,十里设一小站,周盛传的指挥部设在新农镇,适逢设一小站,故此后即以“小站”称呼。这便是“小站”这一地名的由来。

周盛传率军拉荒洗碱,开田种稻,前后历经十余年,水稻品种不断更新,栽培技术逐年改进,加之引入的南运河水含有较丰富的腐殖质,培育出著名的“小站稻”,并成为清皇室的贡米。

周盛传身为天津镇总兵,他在驻屯小站期间,为便于淮军及其家属聚会、敬神和娱乐,还在这里建立起会馆、全神庙和戏楼。全神庙原有大殿、配殿、山门、影壁等建筑,占地约40亩,光绪年间改称“新农寺”。后于1919年进行重修,周氏后人在寺内建周氏祠堂,始有“周公祠”之称。现今,除并列的三祠堂外,其余建筑均已不存。